

专家在“《讲话》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研讨会上表示——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本报讯 70年前,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70年来,《讲话》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讲话》的理论内涵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日前,北京文联研究部和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京联合举办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讲话》是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光辉体现。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创作出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造就了一部辉煌壮丽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

《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此,文艺工作者要聚焦广大群众,多抒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多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董学文认为,《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注意思想、立场、感情的转变,这正是由于文艺要表现“新人物,新的世界”的使命所需要的。《讲话》还强调要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都体现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曾庆瑞看来,什么文艺能够积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奋进,以及他们在各种人生艰难面前的坚强,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抒写。施战军说,《讲话》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这是《讲话》给予我们的最大遗产。鲁迅、赵树理等作家,虽然写作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对人民的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要真正做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就要写出有质感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在具体的剧情中表现出真正的人民形象。



电影《白鹿原》自筹拍以来就受到极大关注,它是影视与文学的又一次联姻,小说再次支撑起电影之魂。陈忠实小说在小说的扉页写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当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还能保留原作的神韵吗?3月31日,这部电影获得了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颁发的公映许可证,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映,至此这部电影“十二年磨一剑”的电影终于可以同观众见面了。此前,该影片曾在第62届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在第36届香港电影节上作为闭幕影片播映。日前,记者采访了陈忠实,说起小说以外的话题,他说的最多的是——我是个外行!

记者:电影终于可以公映了,据您所知,一些提前观赏到《白鹿原》的文艺界人士对电影评价如何?

陈忠实:评价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部电影震撼人心,尤其在今天影视刷过度娱乐化、庸俗化、类型化,满眼都是打打闹闹、穿越戏说的环境下,《白鹿原》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历史厚重感十分难得。电影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我们民族某个历史阶段的命运变迁,以及那个时代中人的生活。第二种观点是觉得电影没让小说的读者满意,电影削弱了小说厚重的思想性和历史性,把那个时代的革命活动、白鹿两家故事里蕴含的民族精神的东西打薄了。原来复杂的叙事线索变成了单线条叙事,电影的核心人物成了田小娥、白嘉轩、白孝文、黑娃、鹿子霖的命运都因为她发生转折。还有一种意见觉得,这部电影能做这样已经不错了。

记者:电影主要对小说做了哪些较大的改动?

陈忠实:电影最后删减为150分钟,到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白鹿原就结束了,具体到人物就是以把田小娥的灵魂镇压在镇妖塔下结束,之前还有一个3个小时的版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

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讲话》后,确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纷纷加入抗日文艺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索谦认为,我们现在学习《讲话》可以有这么一个角度,就是学习毛泽东怎么运用文艺的武器去完成一个历史任务。我们要清楚文艺不仅仅是用来娱乐的,它还承担着很多别的功能,比如审美、教化等。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文化强国,那么文艺在这过程中应该起到相应的作用,这需要作家艺术家们努力创作,也需要有一定的引导。董学文表示,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引领,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活力,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无数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讲话》的思想及其精神正是指引我们破浪前行、克艰制胜的法宝。

要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除了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还应该将写出来的作品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喜欢看我们的新文艺。刘铁梁多年来一直关注民间文艺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的民间文艺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了。现在城镇化、现代化的步伐很快,非遗的抢救和保护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但很多保护工作是往形象工程上走,而不注重怎么让它跟老百姓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傅起凤发现在杂技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杂技过去经常在基层进行演出,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但现在也往大舞台、大制作方向发展,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票。解玺璋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压低票价,直到今年才稍微有一点起色。当然文艺单位也有它的难处,因为都面临着市场化,首先得考虑怎么活的问题。所以,要想为人民服务,首先得占领市场。如果某个作品上座率高,票房好,就说明人民群众是喜欢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黄尚恩)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 人物与时代都是血肉相连的

——陈忠实访谈

的关系很重要。

说到遗憾,我总希望电影能更充分、更准确地通过直接的视觉画面把小说的全部传达给观众,总希望小说里的人物更充分、更集中地与观众交流,但受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时空限制,留下了遗憾。

记者:大片的麦浪、地道的关中方言、原生态的地方戏,使电影《白鹿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初您会觉得大量使用地方戏和方言是一种冒险吗?

陈忠实:贯穿电影始终的唱腔是在陕北地区一种几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腔”,演唱者都是地道的农民,平时就靠在红白事上唱戏谋生。之所以把“老腔”用到电影里还有些渊源,几年前西安一个文化热心人约我去看一场民间艺术演出,唱“老腔”的演员一开口我就被镇住了,那种震撼好像只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才有。后来北京人艺要排话剧《白鹿原》,林兆华托我找些会唱秦腔的民间艺人,我一下想到了他们,林兆华听了也被镇住了,这几个人就这么走上了话剧舞台,后来又出现在电影中,这算不上冒险,我想大家会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音乐,也就是农民们说的“野嗓子”。

至于用方言对话,一开始我建议弄两个版本,一个配方言,一个配普通话,但最后导演还是选择只用方言。方言是生活和时代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中方言许多都是咱们民族的原始语言,古

据新华社电 展馆门口飘扬的五星红旗,展馆里面涌动的中国面孔,众多场次的中国图书全球首发式和中英作家学者的交流对话……这一切都给4月16日在伦敦伯爵宫展览中心拉开帷幕的伦敦书展烙上了“中国印”。

书场:中国元素点亮中国展台

中国主宾国展台有2019平方米,是历届伦敦书展主宾国展台面积之最,其布局也独具匠心。中国展台活动区的一侧是由1万多册中英互译出版的精品图书板块组成的波浪形“书河”。活动区周围,按顺时针顺序依次设置了重点出版单位精选图书展示、中国的数字出版、中国古代出版印刷等板块。从展厅上空看,5个板块以红灰蓝白黄区分,并巧妙地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融入其中。

刷墨、铺纸、施压、揭纸,一张《四美图》本版画应运而生……主宾国展台中央,雕版水印的制作现场吸引了众多英国观众。专程从伯明翰赶来参加书展的英国出版人詹姆斯·霍尔说,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示从汉字诞生、印刷术发明到数字化出版的历程,系统而生动,中国展台的设计很有创意。

书人:交流对话产生观点碰撞

书展刚刚开幕,一场场对话活动就接踵而至。中英两学者、文化名人就出版与文化、电影等话题展开交流,双方精彩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英国作家常常以其他国家为写作背景,但感觉上,中国作家经常只写自己的事。将来会不会有中国作家能以其他国家和文化为写作背景呢?”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首先发问。

“据我所知,很少。可喜的是,已经有了,相信会越来越多。”中国作家王蒙坦言。

在随后的一场活动中,中国导演陆川和英国导演伊恩·索夫特利谈到了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陆川说文学是电影发展的核心动力,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都源自一流的文学作品。索夫特利认为,书和电影并不完全是一码事,电影的拍摄实

际上是再创作的过程。

在关于女性视角的对话中,中国作家铁凝说:“女性有表达自己的天然渴望,更容易将写作作为生活方式。而我在处理写作题材时,更希望自己能获得第三性的视角来描述心中的故事。”作家毕飞宇认为选择女性作为视角更像摄影,“它不如我的两个眼睛看得全面,但有时也许更能有效地塑造人物”。

书市:中国图书展现当代中国

收录了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用英文撰写并发表的51篇重要学术论文的《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中文版举行全球首发式,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和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共同完成的著作《成都调查》首次亮相国际市场,《关注中国——41位驻华官员谈中国共产党》英文版、中国国家汉办新编汉语文教材《中国好人》以及大型画册《中国——新长征》均为全球首发……至此,一大批展示中国形象、表达中国观点、讲述中国故事的图书纷纷亮相主宾国活动,受到国际出版业的高度关注。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总编辑黄友义曾多次参加伦敦书展。他对记者说:“这次书展的亮点就是中国元素,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10年前,这里能有几本中国书啊,但现在你看,国内各出版集团都在推介当代中国的英文版图书,连很多欧美大型出版公司都在打‘中国牌’。”

黄友义说,以往出版走出去多以介绍传统文化为主,本次书展介绍当代中国的选题明显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发展迅速,人家自然会问中国有什么窍门,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有哪些成功之道?这些都是人家关注的。”

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经理帕翠莎·克拉汉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观察到中国图书越来越精美,很多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和制作水平都符合国际标准。这些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和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满足了英国公众想探究中国高速发展秘密的好奇心。”(璩静白旭)

铁凝与柯林斯集团签署 《大浴女》英文版出版协议



铁凝和柯林斯出版集团代表

本报讯 4月16日,正在英国参加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系列文学活动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与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她的长篇小说《大浴女》英文版出版协议。

签约仪式上,铁凝在致词中对柯林斯集团选中出版自己的作品表示感谢,并期待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真实了解当代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以及她们身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柯林斯集团代表帕特里克在签署协议时表示,《大浴女》英文版的出版权是在与多家国际出版集团的竞争中获得的,相信这本书会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认识中国文学、了解中国女性起到很大的帮助。

哈珀·柯林斯是全球最大的英文出版集团之一,在其近200年的出版历史中推出过许多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作家的作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主动将目光投向中国作家,竞相争取作品的出版权,表明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认知度逐步提高。

国土资源作协召开四届五次主席团会议

本报讯 4月15日,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四届五次主席团会议在苏州举行。国土资源作协主席陈国栋、副秘书长黄新燕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作协八届二次全委会相关精神,并明确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应把握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机遇,抓好基础建设,加强与行业作协与地方作协的深度合作,并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推介国土资源作

家,扩大国土资源文学的影响力。

会议提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今年将重点抓好国土资源重大题材创作、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评选颁奖、“昭通杯”首届全国国土资源题材短篇小说大赛”等10项工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2012年申请入会人员名单,确定夏可可等34人为拟发展会员。主席团还审议了首批签约作家申请名单,原则上通过了9名会员的签约申请。(徐峙)

电影的,那些有完整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强烈的冲突的小说更容易改编。编剧、导演、演员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是影像是他们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

记者:现在许多作家都改行当编剧,还有的写小说时老琢磨着怎么能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剧本,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忠实:对那些本身具备编剧天赋和才能的作家,当编剧是件好事,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当编剧,像我,即便写一集给我100万,我也写不出来。我不赞同在写小说时老惦记着改编成剧本,这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如果老想着怎么能把情节写得离奇、惊险,甚至硬要加一些所谓有戏剧性的冲突,这就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

记者:被寄予厚望的《白鹿原》没能拿到“金熊奖”,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我们好像特别着急在国际上获奖,用国际标准衡量我们的艺术创作。

陈忠实:当时剧组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没获奖的原因是“有头无尾”,大概评委觉得电影前半部分对人物命运展示得比较充分,到结尾时很多人物却不见了。能在国际上获奖当然是好事,这不光是中国作家、电影人的想法,各国都如此。但这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能勉强。达不到获奖标准,干着急也没有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获奖者本人都很惊讶,所以我觉得“获奖”是不可期盼的,希望越强烈反而越容易失望。我们就踏踏实搞自己的艺术创作,获奖固然好,获不了也没啥遗憾的,眼睛总盯着奖杯是很难受的。

(李晓晨)

面对

语中的很多词句用法都在其中保留了下来。我在写小说时对使用方言有自己的把握尺度,一直坚持要让其他地方的读者能从字面上把握词句70%的意义,否则我不会使用。电影在方言的使用上走得更远,但他们也听从我的建议删掉了许多粗话和特别生僻的用法。

记者:把地方文化植入影视作品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地域元素”成了影视创作的一个法宝,你觉得这部电影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得怎样?

陈忠实:这部电影的确有浓郁、鲜明的陕北特色,但它没有简单地为影片贴标签,没有刻意离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单纯表现文化符号,这样看上去比之更自然,他们的社会对他们的爱情的扼杀,反而不受小说情节的限制,优美的舞姿也能吸引观众。

记者: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很大,却吸引了众多编剧和导演积极尝试。现在大家都说缺少好剧本,今年广电总局还设立奖金重奖优秀剧本,您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为“剧本荒”提供什么?

陈忠实:他们喜欢这部小说,希望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表现这个故事。讲好这个故事确实很难,人物多,情节多,没有集中的故事冲突,一系列大事件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不是所有好小说都适合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

文学和影视最大的差异是,小说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描写,可以充分展示作家对人物的把握;影视是以直观的形象与观众交流,它的优势是能把文学形象具体化、生动化,比如王安生选了张丰毅,林兆华选了濮存昕,在观众心中白嘉轩就是他们的样子。读者普遍认可的小说都可能成为好剧本的脚本,比如《红岩》《林海雪原》等,但也有些好小说是改不成